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知识分子之“传承”传统伦理道德刍议 [Controversy of the Elites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Ethics]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叶, 凌
Publisher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1 11:49:3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482

叶凌：知识分子之“传承”传统伦理道德刍议

叶凌

知识分子之“传承”传统伦理道德刍议
——基于“五四”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反思之上的反思

叶凌（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省 南京210093）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五四”知识分子功不可没。他们反思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束缚与阻碍，积极承担起“传承”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历史使命，投身于“先破后立”的思想解放浪潮。九十年过去了，当代知识分子继续“五四”知识分子敢于“反思”的传统，在“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反思之上，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继续进行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反思，以“继承”和“创新”作为“传承”的使命。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传承、反思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的运动，其实从时间上，可以上溯到1915年《新青年》的发刊，下延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而1919年5月4日由青年学生在北京发起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性标志事件。时至今日，“五四”运动及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影响之深之远之广，仍旧让每一位炎黄子孙铭记在心、永难忘记。——这场启蒙运动，是“五四”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民族危机，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努力摸索、锲而不舍的结果。也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自这场启蒙运动发生以来，其本身及其影响就一直是社会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则试从“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思入手，结合国情就知识分子群体之“传承”传统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探讨：

一、“五四”知识分子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在传承传统伦理道德方面进行的努力——反思与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实际已经深入到当日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思，则必须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做全面的了解。

（一）时代背景从国内而言，政治领域：清王朝统治终于被推翻，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得以终结。但是，政治舞台上“纷纷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不停上演。有名的皇帝已经死亡，无冕的皇帝仍旧沿用皇权的专制来治理天下。经济领域：封建经济未全然解体，仍旧有大量封建残余，占中国经济极大比例和势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虽然有所发展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一个“短暂的春天”，但仍旧风雨飘摇；再加上东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中国经济是千疮百孔，举步维艰。文化教育领域：封建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再作为整体而存在。1905年科举制度遭到废弃，旧有教育体系奄奄一息，西式教育逐渐发展。而思想意识领域：知识分子群体秉承传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随着一代又一代、一拨又一拨知识分子基于出身阶级、所受教育的不同以及人生阅历的变化，他们对于中华民族落后挨打之深层原因的认识逐渐清晰。从国际而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中国的凌辱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资产阶级掠夺的本性在对华政策上显示地淋漓尽致，各国在对华政策上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日本因明治维新后的强大和甲午中日战争的获胜，也已和西方列强一样，成为掠夺中国的强盗。这些国家以其经济上的强势，获得了国际政治上的强势。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国家内政方面尽失话语权。而1917年的俄

国“十月革命”，则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营垒的阵容，更给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带来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因此，从时代背景来看，当日的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对于真正“民主共和”的追求，是当日中国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需破解的课题。而其中，知识分子群体因其在知识上的优势和由此在社会问题上的进步见解，必将在启蒙性的思想革命运动中占据先锋和引路人的地位。

(二)、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客观存在和影响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有总结性专题论述：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相伴随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被称为“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特征在于：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政治依赖体为皇权专制；以“族类意识”为基本纽带——存在方式是体系内“不存在个体和个性”，任何人均属于“群体、族类”；同时，又非常“讲究群体内个人的伦理责任”；核心被归结成“三纲五常”，而“三纲”在发展的过程中，因统治阶级的需要，被逐渐改造，最终以“失衡性”方式而存在（即绝对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传统伦理道德中各个德目的具体的体现方式，也因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最终被归结成“孝”，且“孝”以“无违”为重——体现出深深的“中国式原罪”的心理和思维模式。在这种中国式原罪心理和思维模式中，老人、君主、圣贤以高高在上的权威形象独霸话语权⁽¹⁾（已有文章以中国历史发展的线条，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需要出发为此做了论证）。

总之，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伦理道德的体系一再被完善，这种完善自然也是按封建统治者的意愿在发展。所以，当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已经来临，这与之相配套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客观存在和影响，自然也面临社会发展的考验。然而，正如前文分析，当日的中国社会，旧有体系全然打破，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但（1）由于伦理道德所具备之“相对独立性”⁽²⁾的特点仍旧不断发挥作用；（2）由于普通人头脑中固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其内心由此产生的分析、解决相关问题的“模式束缚”，以及此基础上对其思维方式形成的巨大惯性之影响；（3）由于基本“人伦关系”表面存在的不变性，容易使人忽略或无法认识伦理道德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客观状况；（4）由于社会上军阀割据、执政府内轮流坐庄的政治事实，使这批封建军阀得到了保住传统伦理道德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来为其政治服务的机会（在政界、经济界、文化教育界以及思想界，就伦理道德的问题，他们展开种种逆流活动。）。所以，知识分子群体对传统伦理道德对当日中国社会发展的束缚和阻碍问题的认识，并非易事，也是不断反思后才得以逐渐明晰。

(三)五四知识分子的任务：先“破”后“立”正如陈独秀所言：“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惆怅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³⁾其声聋发聩的呐喊，石破天惊地道出了一个隐形根本问题的所在——因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⁴⁾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就是讲究伦理政治、崇尚道德教化的国家。因此，伦理道德于中国的革命而言，两者关系当更为紧密。当然，若非“五四”知识分子长期致力于对社会进步、革新、革命进行探讨的社会实践；若非他们在中国文化上的深厚底蕴，为他们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提供了文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了核心内容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若非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学西方得以开阔眼界，了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富批判精神）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若非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风土人情、风俗世故的了解和思索帮助他们比较中西伦理道德教化对个性和国民性塑造的影响，一般来说，以深邃的眼光看清传统伦理道德在当时社会革命当中的破坏和阻碍作用并非易事。战场已经确定，目标已经选好，战士并不多（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仍旧是一个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群体）而面对的，是民国动荡而非真正“民主共和”的政局和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现状，如何来打一场没有硝烟却艰难异常的仗——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取得胜利？如何在思想界、尤其是让作为国家希望和未来的青年人接受“伦理的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观点，认识到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自觉自愿抵制其消极因素的影响，有意识把自己培养成新一代有个性和德行、有生气和创造力的国民？（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所说：（青年人）一要自居to conquer(去征服)地位，勿自居to be conquered(被征服地位)。二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庸品。三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总之，如何使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对革命所起的束缚、阻碍的负面性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争取独立自由的关键时刻尽快为民众接受、领

悟？只有以摧枯拉朽的“思想革命”方式打破旧有的“群体伦理本位”体系，建立“个人感性本位”⁽⁵⁾伦理体系，培养全新的具备自由和独立意识的国民为革命服务，才能满足社会的必要。因此，光靠对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内小零件、小部件进行温情脉脉的小打小敲当然不行！而当时之国情，当日之风云推动，都要求给中国民众一个全然不同的全新理念——这一切都要求知识分子群体在号召普通民众深刻了解旧社会的弊病，体悟旧中国的痼疾之时，必须要有坚强的决心和对旧有思想彻底割断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所以陈独秀说：“吾人尚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⁶⁾所以李大钊说：“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⁷⁾故而，“五四”知识分子面前，历史使命就是要他们先破后立，因为先“不破”，后必不立”——“破”是为了“立”。

于是，“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了他们的优势和长处——由陈独秀率先发起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大量火力极猛的文章。鲁迅的《狂人日记》、《我的贞节观》，李大钊的《青春》等文章，都以文学的形式就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反思。还有《新潮》、《少年中国》、《创造》、《洪水》、《猛进》、《春潮》等杂志，从形式到内容都表明了与旧社会伦理道德彻底决裂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基于他们的学识、修养，“五四”知识分子群体自是知道传统伦理文化中有它的精华所在（这在他们的文章和“五四”后的言论和学术活动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对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反思的结果，就是必须要斩断这个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相配套的思想伦理道德体系，尽快结束因其“相对独立性”对新生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也让军阀政客的专政不能从此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五四知识分子在对待传统伦理道德方面，即以此种“革命”的方式进行了“传承”。这种方式，既是当日社会进步之必须，也是当日社会发展潮流之趋势，更是当日社会革命策略之必然。不可否认，批判是一种继承，反思亦是一种革命。经历了思想意识领域对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反思”革命，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不独是陈独秀、李大钊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以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为首的北大和其他学校的青年学生⁽⁸⁾，面对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黑暗现实积极行动起来，成就了这场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革命风潮。

二、当代知识分子之传承传统伦理道德：基于“五四”知识分子反思之上的反思

（一）时代背景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各族儿女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国际地位与日上升，科学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在思想道德的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在宏观上建立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伴随中华民族的复兴步伐，十七大又与时俱进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目标，当代中国以响亮而自信的口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科学定位。

（二）当代伦理道德建设所有资源的现状和影响当代知识分子群体面对的可用传统伦理道德建设的资源，可以分两部分来看：一指“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二是自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破除旧有伦理道德体系后，“五四”知识分子为新伦理道德建设提供的精神源头。首先我们来看“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在今天社会的存在状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步发展，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物质财富的重新审视和利用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近十余年来，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对古代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它不仅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可实践的观念（如“孝”、“直”、“敬”、“和”等），而且是在飞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现代社会中，思想深处倍感舒适的一贴良药。并且，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不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道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然，传播中华古老文化，自然要世界的人们明白中华古老文化之精髓所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五四”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财富，同样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平等、爱国、民主、科学的理念、对于传统敢于批判、敢于反思”⁽⁹⁾的斗争精神，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优秀的精神传统，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¹⁰⁾也是普通民众心中具备的基本理念。五四知识分子提供的精神源头，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贯彻到革命实践中去，逐步积累汇集而成一整套结合具体国情所建立的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伦理道

德建设大框架：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全社会形成团结友爱、互助平等、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通过）。

（三）当代知识分子的任务：“继承”和“创新”在这种对古老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继续进行反思的追问中，可以明确的是，对于古代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它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尽可以拿来，结合国情、结合时代，通过“现代转化”^①的方式，进行利用。——因此，当代知识分子“传承”的首要任务是“继承”——将上世纪由于革命和求得民族新生而不得已为之进行“断裂”的“传统”与“当代要求”进行对接，这是当务之急、无法推卸的重要任务。毕竟，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上个世纪的前半段时间用在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任务上。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摸索和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经济的任务又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新世纪里，我们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方面，迫切需要源于自身、符合民族特性的文化食粮为我们提供智力、策略和精神支持。同时，这也是普通民众内心深处需要的人文式关怀——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读经班的开办、国学书籍的供不应求，对汉服的留恋、各处公祭大典的举行等，无一不是这种需要的外在体现。但是，由于对于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学习和理解非一朝一日之功，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也非一人一力可行，所以，在学习的选择性上、在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之“现代转化”的理解和解决上、在传播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在人员、场地、时间、要求的制度化问题上，都远远没有完善。因此，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现象大量存在。故而，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注意的，首先就是自身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学习、理解和运用，这是“继承”的第一步。之后，以“群体性方式”积极投身到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传播当中去。当然，随着国民教育体系的日趋完备、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普及日益可能，普通民众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认识将越来越宽泛、理解越来越深刻和到位。这样，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才可能真正如“儒”字的结构，所能做的不仅是传播促进科技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用性“人之需”技能，更能传播文明生活必备的伦理道德知识以满足人民内心深处的需求。进一步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身就是“创新”。以对此问题的“创新”的认识，知识分子继续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开掘传统伦理的历史深度^②，以“创新”的精神完成它的“时代转化”，以“创新”的精神投入到这种新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和文化的传播中去。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在现代社会所获得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而且能够在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学习中，提高自身文明素质的同时，真正回归属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基本伦理关系的稳定性，将会确保祖先留下的这份财富发挥作用。同样，在反思“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思中，我们要明确的是，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为“五四”知识分子提供的是战斗的起点和目标。而“五四”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如此忧国忧民、奋不顾身、锲而不舍，与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浸渍不无相关。从某种程度来说，五四知识分子所承载的“先破后立”的历史使命，也是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时代性“继承”和“创新”的体现。当代知识分子，是一个日渐庞大的群体，是一个深入社会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群体。改革开放给了中华经济的腾飞，更给当代知识分子敢于开拓创新的思想。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使地球相对空前缩小、东西文化空前交流，当代知识分子对“传承”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历史使命感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信心。这是时代的呼唤！但是，基于社会整体改革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基于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理论工作探索的艰巨性和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时差性，也基于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伦理道德建设体系中习惯性地缺乏沟通、交流（尚很大程度属于单枪匹马、各自为阵的作战方式）的特点，因而新伦理道德体系框架下的相关实践活动的时效性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些都应该被注意到。综上所述，当代知识分子必须认清历史使命、把握时代脉搏、改变战略战术，加强联系联合，做好“传承”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

参考文献：

- (1) 葛红兵，《“五四”文化的内在矛盾（1）》，文化研究网2004年10月16日。
- (2) 郭广银，《伦理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5年2月版，第106页。
-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 (4)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 (5) 葛红兵，《“五四”文化的内在矛盾（1）》，文化研究网2004年10月16日。
- (6) 葛红兵，《“五四”文化的内在矛盾（2）》，文化研究网2004年10月16日。

- (7)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
- (8) 唐宝林,《陈独秀与五四运动》,1999年,南方网2004年5月4日。
- (9) 张晓唯,《“五四”:两代人的合作——蔡元培、胡适综议》,南方杂志网站。
- (10) 芦苇的空间(博客),《浅论五四运动的爱国》,2006年2月15日。
- (11) 郭广银、杨明,《传统伦理精华对建构公民道德的启示》,《江海学刊》,1999年第9期,第121页。
- (12) 朱贻庭,《开掘传统伦理的历史深度》,《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05页。
- 作者简介:叶凌,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生。

/